



新编
中国
上下五千年



新编中国上下五千年

(十一)

姜 霞 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三编 大清帝国

摊丁入亩	(3991)
驱逐西方传教士	(3993)
平定罗卜藏丹津	(3995)
年羹尧之死	(3999)
明察秋毫的施世纶	(4002)
能臣田文镜	(4005)
改土归流	(4009)
隆科多之狱	(4013)
中俄《恰克图条约》	(4016)
军机处的设立	(4019)
征讨噶尔丹策零	(4022)
平定大小金川	(4024)
乾隆皇帝南巡	(4028)
贪污犯觉罗伍拉纳	(4031)
廉洁正直的岳起	(4034)
平定准噶尔部	(4036)
策棱	(4039)
名将岳钟琪	(4044)

平定回部	(4054)
征讨缅甸	(4057)
土尔扈特部东归	(4060)
《四库全书》	(4063)
王时敏等艺术家	(4067)
学者齐召南	(4080)
文武双全的阿桂	(4081)
恪勤职守的庆桂	(4093)
林爽文起义	(4095)
征讨安南	(4098)
扬州八家	(4101)
书法家刘墉	(4104)
金石学家翁方纲	(4105)
四大徽班进京	(4106)
乾嘉汉学的兴盛	(4108)
经学家胡渭	(4112)
封疆大吏毕沅	(4115)
经学家王鸣盛	(4118)
经学家钱大昕	(4119)
经学家阎若璩	(4121)
史学家赵翼	(4123)
文史学家章学诚	(4124)
诗人洪亮吉	(4125)
渊博的全祖望	(4132)
经学大师戴震	(4133)
当世名儒焦循	(4136)
学者刘献廷	(4139)

地理学家徐松	(4141)
名医徐大椿	(4142)
瓷器专家唐英	(4144)
数学家李潢	(4145)
击败廓尔喀	(4148)
《钦定西藏章程》	(4150)
马戛尔尼来华	(4154)
乾隆惩治贪官	(4158)
白莲教起义	(4160)
天下第一贪官和珅	(4165)
天理教起义	(4167)
平定张格尔	(4170)
桐城派古文	(4173)
包大炮	(4178)
书法家何绍基	(4179)
书法家张裕钊	(4181)
王澐等书法家	(4182)
古文学家姚鼐	(4192)
曹雪芹与《红楼梦》	(4193)
难得糊涂郑板桥	(4196)
《儒林外史》反君权	(4199)
清代文学狱	(4204)
鸦片战争	(4208)
虎门销烟	(4212)
民族英雄关天培	(4214)
抗英英雄陈化成	(4216)
东南沿海人民抗英	(4218)

《海国图志》	(4221)
无能误国的穆彰阿	(4223)
魏源	(4225)
天文学家王锡阐	(4226)
天文学家陈杰	(4231)
数学家丁取忠	(4233)
数学家谢家禾	(4235)
数学家罗士琳	(4238)
数学家左潜	(4242)
中英《南京条约》	(4246)
中美《望厦条约》	(4249)
中法《黄埔条约》	(4252)
太平天国起义	(4253)
曾国藩组建湘军	(4257)
太平军的北伐西征	(4260)
小刀会起义	(4262)
捻军起义	(4266)
八国联军侵华	(4270)
列强开辟租界	(4273)
天地会起义	(4276)
回民起义	(4279)
第二次鸦片战争	(4284)
中俄《璦琿条约》	(4288)
《天津条约》的签订	(4290)
太平军进攻上海	(4292)
洋务运动	(4296)
早期改良思潮	(4301)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4306)
李鸿章建淮军	(4308)
南昌教案	(4310)
天京保卫战	(4312)
左宗棠	(4315)
京师同文馆的设立	(4329)
学者王先谦	(4331)
阿古柏入侵新疆	(4332)
天津教案	(4335)
海防与塞防之争	(4337)
马嘉理事件	(4339)
中法战争	(4341)
黑旗军抗法	(4345)
马尾海战	(4348)
镇南关大捷	(4350)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4352)
康有为的《大同书》	(4354)
古文学家林纾	(4356)
袁世凯小站练兵	(4358)
甲午战争	(4360)
甲午海战	(4364)
民族英雄邓世昌	(4367)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4369)
中日《马关条约》	(4372)
三国干涉还辽	(4374)
反割让台湾斗争	(4377)
公车上书	(4379)

戊戌变法	(4381)
康有为	(4385)
强学会	(4389)
《中俄密约》	(4391)
· 《时务报》创刊	(4393)
孙中山伦敦蒙难	(4395)
戊戌政变	(4398)

摊丁入亩

明朝末年，由于严重的土地占有和繁重的赋税负担，引起了农民大起义。清朝建立以后，对赋役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朝廷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把丁税总数固定下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但这一政策并未能解决丁役负担不均的问题，地方官绅往往利用人口流动等因素，把赋税转嫁到下层百姓身上。因此，改革赋役制度势在必行。

康熙十三年（1674年），江苏布政使慕天颜曾在苏、即松江、杭、即嘉兴四府，准备实行均田役法，即把县中土地均摊各里、各甲，由土地的多少决定赋役的多少。康熙二十年（1681年），直隶乐宁县知县于成龙也提出实行均田、均丁法，以使富户增加、贫者减轻负担。其后，湖南安乡县也部分实行了“地丁随粮摊”的尝试。但最早正式提出“摊丁入亩”主张的，是康熙五十二年（1673年）御史董文燧，建议“统计丁粮，按亩均派”。虽然户部没有采纳，却允许在广东、四川先作试行。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广东正式将丁银在田亩中分派。稍后，四川也将“田载于而输纳，丁随田而卖买”的办法付诸实施。

根据直隶总督李维均的奏请，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向全国正式颁布诏令，实行摊丁入亩制度。但各省的实际实行则先后不一，先后五十年之久。雍正二年（1724年），直隶、福建省实行；雍正三年（1725年），山东省实行；雍正四年（1726年），云南、河南、陕西、浙江、甘肃省实行；雍正五年（1727年），江苏、安徽、江西省实行；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广西省实行；雍正七年（1729年），湖北省实行；乾隆元年（1735

年)，山西省实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贵州省实行。省内各州县之间，实行时间也有较大差距。如福建省于雍正二年宣布实行，但一些州县一直迟迟未行，拖延十数年之久。

“摊丁入亩”的具体办法，就是把一县的丁役银钱总额，分别摊入到该县的每亩土地中去。从土地田赋中征收，而不再按人头征收。各省地亩摊丁平均数字，湖南省最高，一些县达到八钱六分一厘，因其是“以粮石载了”征收。其次是福建、山西等商业较发达的部分州县，丁多地少，所以每亩数较高。

“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实际上废除了人头税，只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它的实行，简化了税收的原则和手续，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是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从而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一定好处，也减少了地方官绅利用人口数字贪污中饱的机会。同时，废除了人口的丁役，使地方的人身依附得以松弛，为人口的流动创造了条件。但不再对人丁征役，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无节制增长。

摊丁入亩的实行，把农民负担的一部分赋税转摊到地主身上，因此，也遭到不少地主官僚的反对。早在正式颁行之前，康熙四十年（1701年）浙江布政使赵申乔就坚决反对过“按粮户田数之多寡，定人丁之等则，光丁豁除”的征税办法，主张“地丁原属两项，似不应地上加丁”。他还下令镇压了宁波府“倡照地派丁之说，与巨室相持”的百姓。雍正元年“摊丁入亩”在全国实行后，各地的反对也随之强烈。浙江“田多丁少之土棍”煽动数百人，“齐集巡抚衙门，喊叫阻挡摊丁”，巡抚法海只得令官员“暂缓均摊之议”。雍正六年，“摊丁入亩”在浙江已实行两年，钱塘、仁和两县的地主又强迫佃户交租时，“每亩米加二升，银加二分，以助产主完丁之费”。同时，直隶肃宁县的地主也借“摊丁入亩”之际，把佃户的地租每亩增加二分。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官员胡泽潢在奏折中还认为“丁粮摊入地亩，

永不加赋”是造成户口不确定的原因，坚决反对实行这一制度。另一方面，下层人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同破坏这一制度的官员地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雍正三年，杭州“有丁无田，情愿均摊”的农民，联合无地的工商业者，抗议巡抚法海等少数地主的退让，他们围着衙门吵闹，发动罢市，一直闹到法海被撤职，又涌入知县衙门继续斗争。

“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废除了几千年以来压在人民头上的丁役，对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驱逐西方传教士

自从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入华以来，西方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至康熙末年，各省教徒数字已达三十万，拥有教堂、住院三百座以上。这股外来势力终于引起了清统治者的不安。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胤禛即位不久，便下令全国开始驱赶西方传教士。

雍正元年，在传教士的根据地——福建省福安县，一个生员教徒宣布离教，与其他人联合向官府指控教士们敛聚地方民财修建教堂，并使男女混杂，伤风败俗。知县傅植很快接到总督满保的命令，亲赴各处教堂查禁，但遭到信奉天主教的生员郭于宣等人的反对。六月初一，闽浙总督满保下令捕拿郭于宣等人，将传教士驱往澳门，无论他有无朝廷过去发给的传教信票。八月初八，福建省巡抚黄国材又与总督联名告示全省，指出省内各处教堂均在查禁之列。

十月二十四日，满保将福建禁教情况具体上报，并请诏令在全国禁教：“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住行教，人心渐被煽动，毫无裨益。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

雍正帝下令将题本发礼部会议复议。十二月八日，礼部官员开始会议满保题本。主持礼部的康熙十二皇子允禩因与教士过往较密，企图提出另一个折中方案，但由于有关官员向他暗示禁教是雍正帝的旨意，只得放弃。几天后礼部复议：“应照该督所请，除奉旨留京效力者外”，其余起盖的天主教堂俱改为会馆。十二月十六日，雍正帝下旨：“西洋人乃外国之人，各省居住年久，今该督奏请搬移，恐地方之人妄行扰累，著行文各省督抚，伊等搬移时，或给与半年数月之限令其搬移。”至此，清廷正式诏令在全国驱逐西方传教士。

造成西方传教士被驱逐的原因十分复杂。首先，一些传教士卷入了康熙末年皇子夺位之争，支持雍正的政敌允禩，直接导致了雍正帝的报复行动。其次，这场禁教运动又是始于康熙后期的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礼仪之争”的延续。1715年罗马教皇发布禁约，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天，康熙帝也针锋相对地颁发内务府信票，只准承认中国礼仪的教士留在中国。雍正帝即位后，又把范围缩小到只准少量教士在北京活动。最后，基督教宣传的人人平等形式被民间一些秘密反清结社组织所借用，如号召建立西洋理想国度等，也引起了清廷的恐慌。

雍正帝下达谕旨后，在京传教士决定上奏吁请缓行驱逐教士行动。在钦天监任职的传教士戴进贤于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十一日奏上一折，辩解天主教入华“守法焚修，原非左道”，请求允许各省教士在广东居住。雍正帝在硃批中予以严厉批驳，指出驱逐一事“旨由福建省住居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众”。其后，又召见传教士戴进贤、巴多明、白晋，当面训谕：“朕若派僧道喇嘛赴西洋传教，尔等何以侍之？”尔等若以欺蒙皇考得逞，毋望复能欺朕！”然而，他终于答应了传教士暂留广东的请求。十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孔毓珣奏准，暂令传教士在广州天主堂居住，不许传教，也不许百姓入教。

在此之前，各省官员已掀起了驱逐教士的浪潮。直隶、广西、山西、江苏、福建、山东等省的教堂被查封，改为书院、祠堂、育婴堂或谷仓等公所。各省教士开始向广东移送，途中遭到民众的斥骂和殴打。驱至广东的教士，有耶稣会士三十七人，方济各会士十三人及多明我会士数人。他们最终仍难逃被驱逐出境的命运。

雍正七年（1729年）闰七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再次字寄各省，“近闻外省府县中竟尚有潜居住”的教士密秘传教，应再行清点驱逐。结果将江南、浙江省原称年老养病的毕登荣等传教士驱往澳门。雍正十年（1732年）六月，广东总督鄂弥达得旨，将雍正二年（1724年）允住广州的三十五名教士驱往澳门，解散广东教会。戴进贤在京再次上奏乞留。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月三日，雍正帝召见在京教士，严辞斥责道：“彼寄居广州被逐出境，乃理之当然，又何词之有。即汝辈在京亦岂能入居耶！”此后，公开在华的西方传教士仅留北京的戴进贤等二十余人，以修历为业，不得再行传教。

雍正帝驱逐西方传教士的措施在鸦片战争前一直被历朝统治者承袭，成为清廷对外的一项基本政策。这种不分良莠一概驱逐的做法，客观上加剧了清朝社会对外一无所知的闭塞状态。

平定罗卜藏丹津

青海和硕特蒙古是顾实汗在1636年击败却图汗后自乌鲁木齐地区移居过去的。后来，顾实汗虽然立足于西藏，但青海仍为其根据地。顺治六年（1649年），清政府分别赐给协助清军作战有功的顾实汗第二子鄂木布、第七子瑚鲁木什以“土谢图巴图尔岱青”、“巴图尔额尔德尼岱青”的称号，以示对青海和硕特部的

笼络。顾实汗死后，其留在青海的诸子相互纷争，并不断率番众抢掠内地，抗拒清兵，使清廷颇感头痛。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派额駙阿喇布坦到青海召谕和硕特部领袖人物归附。阿喇布坦与顾实汗当时仅存的幼子达什巴图尔、塔尔寺大喇嘛察罕诺门汗召集青海和硕特部诸台吉在察罕托罗海会盟，号召诸台吉归附清朝中央政府。此后，达什巴图尔又率青海诸台吉到北京入觐，康熙帝封达什巴图尔为和硕亲王，对其余诸台吉则赐以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及辅国公等爵位。至此，青海和硕特蒙古虽然被清朝招抚，但地方割据势力仍然十分强大。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在西藏的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杀死其政敌第巴桑结嘉措，废黜达赖六世仓央嘉措，另立伊希嘉措为达赖六世。这件事为清政府所支持，却引起了青海和硕特部一些领袖人物的强烈不满。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达什巴图尔去世，其子罗卜藏丹津袭亲王爵位，为青海和硕特部首领中爵位最高者。罗卜藏丹津等人拥立理塘出生的噶桑嘉措为达赖喇嘛。当清政府下令将噶桑嘉措护送入藏坐床时，罗卜藏丹津参加了清军的这一行动。罗卜藏丹津等青海蒙古王、贝勒、台吉各自率所部兵，或数千，或数百，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春随大兵护送达赖喇嘛入藏，军容强大。当时，罗卜藏丹津等人之所以如此踊跃协助清军，是因为“先经阿穆瑚郎汗（指康熙）有旨，取了土白忒国，将尔等（指青海和硕特部台吉）内中立汗。”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秋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春这段时间内，罗卜藏丹津曾参与管理西藏地方政府事务，然而时间不长，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西藏的治理便趁机正式废除了和硕特汗庭在西藏的统治，任命康济鼐、阿尔布巴等藏官为噶伦，共同负责西藏事务。这样，罗卜藏丹津就无权再过问西藏政务了，其再建和硕特汗庭在西藏的统治的美梦化成泡影。

在罗卜藏丹津看来，和硕特汗庭统治西藏已经十八年，驱逐

准噶尔以后，恢复和硕特汗庭在西藏的统治地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他作为当时惟一有亲王爵位的和硕特部首领继拉藏汗之后而成为统治西藏的汗王，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清政府当时政局稳定，势力蒸蒸日上，已经有能力直接过问西藏政务了，当然不会再赐给罗卜藏丹津“汗”的封号，使之接替拉藏汗的位置统治西藏。罗卜藏丹津等人由于在达赖七世坐床典礼上受到冷遇等原因，已经对清政府心怀不满，在佛像前发誓一定要恢复和硕特部的“霸业”。并且，清政府对青海和硕特蒙古本身也采取了“众建分治”的政策，以防其权限过大。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清政府封赏参加入藏驱逐准噶尔战争的察丹津封为亲王、原为贝勒的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雍封为郡王，从而严重削弱了罗卜藏丹津的权力，致使罗卜藏丹津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愈加尖锐。

雍正元年七月，罗卜藏丹津迫使青海蒙古各台吉于察罕托罗海会盟，他自称“达赖浑台吉”，强令青海诸台吉都使用旧时名号，一律不准称王、贝勒、贝子、公等封号。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雍与亲王察罕丹津因拒绝听命于罗卜藏丹津，遂遭到罗卜藏丹津的武装进攻，寡不敌众，不得不向清政府求援。清政府得知变乱的消息后，一面命令川陕总督年羹尧前去坐镇西宁，密切注视罗卜藏丹津的动向；一面命令兵部侍郎常寿前往罗卜藏丹津驻地沙拉图，宣布清廷谕旨，令其罢兵和睦。罗卜藏丹津虽然对清政府怀有怨恨、忿懣之心，但尚无与清廷争雄天下的志向。然而，他进攻清廷所支持的察罕丹津和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雍，拘禁常寿，并且在西宁周围制造骚扰，这样便将自己置于清政府的对立面。

在罗卜藏丹津煽动之下，青海各地喇嘛寺院的僧人起而响应叛乱。青海境内两座最大的格鲁派寺院——湟中的塔尔寺和互助的郭隆重寺都卷入了这场叛乱之中。塔尔寺的大喇嘛察罕诺们汗

在青海威信极高，他站到叛乱势力一边后对青海僧人影响尤大。郭隆寺是清朝有名的章嘉呼图克图的寺院，由于章嘉一世的转世灵童当时年仅七岁，所以也被该寺上层喇嘛裹挟参加了叛乱。为了不使叛乱继续蔓延，清政府决定采取断然措施进行镇压，派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奋威将军兵钟琪攻打青海地区；派平逆将军延信驻守甘州、靖逆将军富宁安驻守安西，以防罗卜藏丹津与准噶尔合兵；派总兵周瑛领兵两千驻藏，以截断罗卜藏丹津逃往西藏的道路。在完成这些部署之后，清军集中优势兵力逐个攻破西宁附近叛军盘据的据点和寺院。其中，清军在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攻打郭隆寺一役最为激烈。该寺僧人负隅顽抗，清军浴血奋战，“以兵三千，破贼万余”，将该寺院建筑全部焚毁，故而年羹尧说：“自三藩平定以来，未有如此大战者。”

在西宁附近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以后，清军便转入进攻罗卜藏丹津游牧地的战斗阶段。年羹尧采纳岳钟琪“乘春草未生”而“捣其不备”的作战方案，于雍正二年二月八日分兵三路进剿罗卜藏丹津，这三路清兵分别是：总兵吴正安所率领的北路，总兵黄嘉林、副将宋可进所率领的中路，岳钟琪与侍卫达鼐所率领的南路。二十日，清军探知罗卜藏丹津驻扎在乌兰穆和尔一带，于是岳钟琪率军连夜前去偷袭，到罗卜藏丹津驻地时，叛军刚刚入睡，因清军的突然攻击而手足无措，纷纷抱头逃窜。清军在这次战斗中俘获了罗卜藏丹津的母亲和妹妹，此后又在乌兰白克地方的一次战斗中俘获叛军头目吹拉克诺木齐等人，战果辉煌。罗卜藏丹津在清军的穷追猛打之下走投无路，不得不携带妻妾逃往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处。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帝派兵攻灭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割据势力，当时逃到准噶尔部的罗卜藏丹津被迫向清政府投降。由于全国局势已经稳定，所以清政府将罗卜藏丹津押解到北京后并没有处死，只是将其软禁至死。

罗卜藏丹津叛乱平定后，清政府于雍正二年（1724年）五

月采纳年羹尧提出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和《禁约青海十二事》，对青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政治上，清政府对青海地区蒙古族各部编旗设佐领，并规定了会盟与朝贡制度；在经济上，清政府采取了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的各项措施，对西宁周围可耕之地实行屯垦；在宗教方面，清政府严格限定塔尔寺等寺院的规模、僧俗总数，以防成为藏污纳垢之地。青海地区从此完全被置于清朝政府的直接统辖之下，和硕特汗庭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年羹尧之死

雍正三年十二月（1726年1月），原任川陕总督，贵戚重臣年羹尧在京城刑狱中奉旨自绝，年仅四十七岁。他的死，引得朝野议论，私下里纷纷传说皇上兔死狗烹，功高盖主的年大将军成了牺牲品。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任内阁学士，后擢四川巡抚。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遣军进攻西藏。四川提督康泰等官不能带兵御敌，年羹尧自请驻松藩办事督军；授四川总督。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随平逆将军宗室延信入藏，因军功受皇帝赐弓箭，再授川陕总督。康熙帝病危之际，谕召贝子、抚远大将军允禔回京，以年羹尧代管抚远大将军印务，主持西北用兵。

年羹尧的胞妹是雍正帝的贵妃。胤禛为和硕雍亲王时，为在诸皇子中夺得皇太子的地位，官至封疆大吏的年羹尧即为拉拢对象之一。年羹尧虽然久任在外，却经常与雍正书信往来，置康熙帝谕大臣不得私自结交皇子的禁令于不顾。如果有一段时间不来